

共青团工作资源系统及其结构优化

■ 胡洪彬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社科部, 浙江 杭州 311231)

【摘要】 共青团工作的开展不仅需要以制度资源、组织资源和人力资源为保障,同时也需要强化历史资源、理论资源、社会资源、物质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系统投入,这些资源共同构成了共青团工作资源的有机系统。共青团工作的有效开展需要基于执政党主导型、社会参与型和“执政党-社会”协作型三大模式进行资源配置。当前要提升共青团工作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就必须在着力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过程中,推进共青团工作资源系统的科学化。

【关键词】 共青团工作 资源系统 配置模式 优化路径

不断提升各级共青团服务青年群体的工作能力,引领广大青年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积极贡献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赋予共青团的一项神圣使命和任务,也是我国各级共青团工作开展的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群团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的重要工作……新形势下,党的群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滞不前。”^[1] 这为今后我国各级共青团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笔者认为,要着力提升我国共青团的工作能力,不仅需要各级共青团明确自身定位和强化同其他组织的协同性,同时也亟须对共青团的工作资源进行深入挖掘和系统配置。从某种程度上讲,共青团能否提升自身影响力和凝聚力,关键在于对其资源的配置是否实现了系统化和科学化。本文基于系统分析视野,研究了共青团工作资源的架构、模式及其优化路径,以期为推进今后我国各级共青团事业的科学化发展提供借鉴。

一、共青团工作资源的“三层”系统架构

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论述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就将资源划分为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两大层面。时至今日,有关资源的概念更是被学界普遍应用,成为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资源依赖理论甚至将资源视为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显然,共青团作为由执政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要顺利开展工作同样也离不

收稿日期:2016-11-04

作者简介:胡洪彬,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社科部副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全面从严治党的党风廉政建设问责制研究”(课题编号:16YJC710013)、2015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重点项目“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的廉政建设思想研究”(课题编号:15NDJC026Z)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开各类资源的配置和供给。所谓共青团的工作资源就是各级共青团在开展工作中所需求的各类积极要件、关系及因素的总称。作为一个系统架构,其大致可分为基础性资源、运转性资源和保障性资源三大层面。

(一)共青团开展工作的基础性资源

基础性资源是各级共青团开展工作时所需要的基础,主要涵盖了有关共青团工作的理论、历史和社会资源三部分。

理论资源是共青团工作开展的思想根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青年观是共青团工作开展的根本性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推进阶级革命的进程中对青年群体给予了高度关注,马克思曾严厉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对青年成长带来的不利影响,恩格斯则提醒青年人不能过分看重经济利益,历史发展是无数个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的结果,青年人必须克服把唯物史观庸俗化的倾向。列宁指出:“尤其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要由青年来担负。”^[2]青年团的任务就是确保青年人“从小就在自觉的有纪律的劳动中受教育”^[3],以“保证共产主义建设成功”^[4]。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使其作为理论资源为当下共青团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根本方向。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共青团工作开展的直接性理论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行动指南,共青团作为党领导下的组织机构,应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积极贡献力量,这是共青团工作开展的直接理论依据。

历史资源是共青团在长期的青年工作中累积而来的影响力。1920年8月,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党的创立者们就在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机构,此后北京、湖南等地的青年团纷纷成立。青年团积极配合党的革命和建设工作,团结和教育广大青年学子,为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做出了积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执政地位的确立,青年团的定位也发生了相应改变。毛泽东强调,青年团既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也要有自己的独立工作,更要照顾青年特点,为青年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57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引领青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基于国家体制转型的背景,进一步强化了共青团的体制完善工作,此后在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共青团的工作体制不断走向规范化。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共青团和青年工作,明确强调团组织要做值得更多青年信赖的贴心人,使共青团成为更多青年遇到困难时想得起、找得到、靠得住的力量。可见,中国共青团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源,这些资源为其更好地开展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社会资源是共青团做好青年工作可利用的社会积极因素和条件之总和。共青团除了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之外,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和群众性,做好共青团工作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参与。从某种程度上讲,积极搞好共青团建设不仅仅是执政党和共青团的“内部事务”,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即共青团的工作开展离不开社会资源的支撑和推动。从内在构成上看,这些资源涵盖了共青团在工作实践中获得的社会信任资源、社会各界对共青团工作开展状况的认同资源,以及各社会主体参与共青团工作的网络资源等。社会资源是共青团在青年工作中累积而来的社会秩序和参与体系,其存量的提升不仅有利于共青团和社会参与者在青年工作事务上建立紧密的关联和互动,也有助于双方在推进青年发展中达成共识,从而推进共青团工作实现科学化。

(二)共青团开展工作的运转性资源

运转性资源是为维持共青团工作正常开展而提供能量的各类要素,主要包括共青团工作的权力资源、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三部分。其中权力资源是执政党赋予共青团的组织领导权力,

是各级共青团组织有序运转的权力支撑。对此,《中国共产党章程》强调:“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受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共青团的地方各级组织受同级党的委员会领导,同时受共青团上级组织领导。”这表明中国共青团实行“双重领导”体制,既要接受执政党各级组织的领导,同时也要接受共青团内部的系统领导。也就是说党章明确了上级团组织对下级团组织的领导权力。共青团的上级组织应基于自身责任及时将党的指示和团的要求传达到下级团组织中去,协调下级团组织间的关系,指导下级团组织的工作。而作为共青团的下级组织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应坚决执行上级团组织指示,绝不能做出与党中央和上级团组织的指示相违背的决策。正是执政党赋予了共青团组织架构内的领导权,才有力保障了共青团工作的有效开展。

物质资源是共青团正常工作所必需的物资和财政来源。一定的资源和财政投入是共青团工作开展的根本保障。作为由执政党建立并领导的组织机构,党章明确指出:“党要坚决支持共青团根据广大青年的特点和需要,生动活泼地、富于创造性地进行工作。”这从一个侧面为党给予共青团必要的物质资源支撑提供了依据。除此之外,共青团的物质资源还来源于团属经济实体的收益、正当的社会资助、团费交纳等,这也是《中国共青团章程》中明确规定的。以2014年为例,该年度共青团中央收入预算为47 059.95万元,其中2013年结转4 280.2万元,财政拨款收入42 179.75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230万元,其他收入370万元^[5]。正是这些物质资源的投入才确保了共青团的稳定运转。

文化资源是由共青团的价值观、信念和处事方式等构成的组织文化。共青团充足的文化资源有助于提升广大共青团员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坚定了他们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共青团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坚定的信仰、价值观和组织文化,这些文化资源主要涵盖以下四个层面:一是坚定地服从和维护党的领导。即在思想上同执政党保持高度一致,紧紧围绕党的目标开展青年工作。二是坚持以青年为本。即组织活动切实做到尊重青年,把握青年成长规律,并在服务青年的过程中促进青年全面发展。三是追求社会主义民主自由。核心是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民主观和自由观,维护青年进行民主参与和监督的权利。四是坚持群众性。即坚持从青年群众中来、到青年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在积极联系和服务广大青年群众中实现自身价值和目标。

(三) 共青团开展工作的保障性资源

保障性资源是为共青团工作开展提供保障和支撑的各类要素,主要包括共青团工作的组织资源、制度资源和人才资源三部分。其中组织资源是执政党构建的各级共青团的组织架构,在纵向上包括团中央委员会、团省区(直辖市)委员会、团地地委员会、团县(市)委员会、团基层委员会和团支部等从中央到基层的组织体系;在横向上则包括了各单位和机构内设的共青团组织体系,由此确保共青团工作得以顺利展开。制度资源是共青团工作开展必须坚守的机制规范体系。目前,涉及共青团工作开展的条例主要以《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青团章程》等为主,在此基础上,一些相关机构制定了更为详细、具体的团组织工作条例,这些相关制度和规范构成了当下各级共青团工作的整体性制度框架。人才资源是共青团开展工作的智力支撑,是涵盖团组织的领导人才、理论创新人才、思想教育人才等在内的多重人才资源体系。在当前落实中央群团工作会议精神的背景下,共青团能否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引导和动员广大青年群体走在时代前列,关键在于团组织是否具有充足的人才资源储备,这是未来共青团发展中必须加以重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共青团工作资源系统的“三重”配置模式

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任何系统要实现稳定发展,其内部各要素就必须实现紧密配合,系统同

外部环境必须达到开放互通状态,这是确保系统功能得到最大发挥的基本前提。要推进共青团工作的顺利开展,共青团工作资源系统也必须保持开放状态,实现基础性资源、运转性资源和保障性资源三层系统架构的最佳协同。要达到这一状态就必须基于系统科学视角,对共青团工作资源的配置模式做出分析。系统思维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出现,但真正走向成熟则是20世纪之后,以奥地利学者贝塔朗菲(L. Von Bertalanffy)“一般系统论”的建立为起点,标志着现代系统科学的真正诞生。此后,系统科学方法在各领域不断得到应用。如在社会学领域,一些社会学家借鉴一般系统论的原理来分析社会的层级结构和组织架构,由此诞生了以帕森斯(T. Parsons)、霍曼斯(George C. Homans)等为代表的社会系统论专家;在政治学领域,一些学者对政治行为及其组织结构和功能进行了系统分析,推动了政治系统理论研究的开展,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和阿尔蒙德(Almond Gabriel)等即为其代表,为推进现代政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社会政治领域的系统分析主要是基于动因、过程及反馈体系等角度对系统的结构功能做出探讨,如帕森斯就认为,社会大系统包含了适应(A)、目标达成(G)、整合(I)和维模(L)四个基本系统(即AGIL图式),并指出这四个要素性系统功能的满足,是保持社会大系统稳定性的前提。阿尔蒙德则将政治体系视为“社会在其国内和国际环境中,有意识地制定和追求集体目标的工具”^[6]。伊斯顿则着力对政治系统的运作过程做出具体分析,他将政治系统视为“一个开放的、自我调节的和自我转变的系统”^[7],该系统通过输入、输出和反馈等环节而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同时又反转过来影响环境,这其中“输入”环节包含了“支持”与“需求”两部分;“输出”环节是政治系统对外在环境的作用和影响;“反馈”环节则是政治系统经过信息输出后进一步产生的反效应,通过这三大环节实现政治系统的稳定发展。

随着国外学界对社会政治系统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近年来国内学界也积极参与其中,在共青团的组织研究领域,目前已有部分成果问世。如有学者基于文化多元化背景,分析了共青团话语系统的建构模式,认为建构科学有效的话语系统,是共青团提升组织影响力的重要途径^[8]。有的学者则从“需要—动力”的系统结构功能视角,阐释了高校共青团组织效能的建设策略,认为共青团唯有摸清学生群体的内外需求,才能实现组织效能的提升^[9]。但基于工作资源视角对共青团工作开展状况进行的系统研究,目前国内学界还未曾出现。事实上,对组织资源的分析不仅是现代管理学的重要命题,同时亦是政治系统论研究的内在诉求,伊斯顿就把资源定义为政治系统获取成员支持的必要前提。

从资源系统的角度来审视共青团的组织发展和工作实践,不难发现各级共青团只有真正通过自身的工作实践,才能有效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和维护青年合法权益,而实现共青团工作资源系统配置的科学化则是基本前提。对此笔者认为,中国共青团的工作资源虽包括基础性、运转性和保障性三层架构,但所有这些资源就其根本来源而言,主要还是来自于执政党“自上而下”的建构和社会“自下而上”的让渡和给予两个方面。如组织资源、制度资源、理论资源和权力资源就是典型的由执政党赋予共青团的工作资源,而信任、网络参与等社会资源则是社会主体基于共青团的工作绩效而主动给予的。此外历史资源、人才资源和物质资源等则具备执政党和社会双重供给的属性。也就是说,执政党和社会从根本上构成了共青团的两大配置主体,二者共同构成了共青团工作资源的结构功能系统。基于此,笔者认为共青团工作资源的配置可划分为三重模式。

第一,执政党主导型配置模式。其具体配置过程由执政党基于执政需求向各级共青团配置资源,共青团的各级组织通过资源耗费和政策输出作用于青年工作实践,以及针对共青团的工作绩效进行信息反馈等环节构成。作为执政党领导下专事青年工作的政治性团体,共青团的组

织建构和工作开展本身就是执政党执政行为在青年群体中的一种政治延伸,是执政党通过共青团这一政治性组织而实施的一系列政治行为,可以说,共青团构成了执政党提升对青年群体执政能力的重要根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必须从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政治高度,抓好党的群团工作。可见,执政党客观上构成了共青团工作资源系统最为重要的配置主体,其各类资源的供给不仅构成了共青团的合法性根基,也为具体的工作开展营造了良好环境,在此基础上各级共青团通过政策输出来做好青年工作。而作为共青团服务对象的广大青年群体亦可通过积极有序参与,就团组织的活动向执政党和共青团做出反馈,为进一步提升共青团的工作绩效提供帮助。

第二,社会参与型配置模式。共青团具有政治属性,但同时也具有社会性,这表明社会各界基于信任和认同为根基的有序参与构成了共青团工作资源的参与性配置主体。共青团的活动如果偏离广大青年群体的现实需求,则必将在走向空壳化和官僚化的过程中丧失发展动力。因此,共青团工作需要以信任、认同和有效参与为前提进行社会资源配置,这不仅对共青团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而且在关键时期甚至能够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如广大青年群体对共青团开展工作的认可度、信任度,以及在项目推进中的参与深度等,这些价值层面的潜在资源虽是无形的,但其存量状况往往直接决定了共青团工作项目运作的顺利与否。在社会参与配置模式中,社会主体通过对共青团进行资源配置,而各级共青团则通过对资源的吸纳、整合、消耗和信息输出,进一步作用于广大青年并接受其信息反馈,从而为推进共青团的工作开展提供帮助。

第三,“执政党-社会”协同配置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执政党作为主导性资源配置主体和社会作为参与性资源配置主体紧密协同,以促使各级共青团实现更好地服务于青年群体和引导青年群体健康发展的价值目标。事实上,在共青团的工作实践中,执政党同社会的资源配置在很多时候并非孤立存在。从历史发展的脉络角度看,中国共青团自成立以来,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通过对先进文化的传播和自身的积极活动来配合执政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而奋斗不息;还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人才、物质资源等方面的累积,在工作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带领广大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贡献自身力量,中国共青团这些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都是执政党和社会共同协作进行资源配置的结果。今天,要推进各级共青团工作的有效开展,同样也需要执政党和社会各界对共青团工作资源的配置实现紧密协作与互动,这也是推进共青团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共青团工作资源系统的“三条”优化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群团工作,要求各级群团组织要承担起引导群众跟党走的任务,进一步指明了共青团发展的责任和使命。201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从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运行机制和机构设置等层面进一步明确了共青团改革的总体方向。当前,积极推进共青团的改革工作,既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也是各级共青团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上文对共青团工作资源架构模式的分析,笔者认为,当下各级共青团要积极贯彻中央关于群团改革的精神,不断提升工作能力,而积极推进其工作资源系统的优化是当务之急。对此,应着力做好以下三个环节的结构优化工作。

(一)从“入口”环节着眼,积极推进共青团工作资源实现最大程度的存量积累

首先,对于执政党主导配置的工作资源,各级共青团组织要着力进行开源。如前所述,共青团工作是由执政党领导下的政治实践,执政党是共青团工作资源的配置主体,这从根本上决定

了要推进各级共青团工作能力的提升,执政党和共青团都必须基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青团章程》《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的相关精神,把系统挖掘和有效配置相关资源摆在重要位置。如针对共青团组织活动的理论资源,虽然近年来国内学界已进行了持续研究和探索,但就执政党自身的理论建构而言,目前学界对共青团理论资源的研究整体上还稍显滞后。当前应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高度,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团学理论和青年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创新,由此为提升共青团的工作能力奠定更为扎实的理论根基。而对于制度资源,执政党作为根本性的领导主体也应基于当前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和共青团发展的现实要求,围绕党章和团章进一步做好对相关条例的梳理工作,从而为各级共青团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制度保障。

其次,对于社会参与配置的工作资源,各级共青团组织要着力做好节流。社会资源是共青团开展工作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但这类资源具有天然的民间性和动态性,共青团工作稍有疏忽就有可能导致其流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团组织积极强化自身建设,团组织的活力不断得到增强,这为团组织在新时期积累社会资源提供了有效保障。然而在当前转型期,我国部分共青团组织还不可忽视地存在一些问题。如在工作开展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和“娱乐化”倾向^[10]。面对这一境况,要防止共青团社会资源出现流失,各级共青团必须把进一步强化自身建设摆在首位,并以此为基础着力推进社会参与主体对共青团工作以信任为主导的规范化参与网络建设。信任是合作的心理根基,是社会体系中最重要、最综合的力量,而规范化则是社会有序运转的根本前提,亦即基于信任的规范化参与网络构成了共青团工作开展的外在保障力量。为此各级共青团要坚持践行群众路线,不断拓展自身同社会参与者联系的广度和深度,在提升参与积极性、规范性和有序性的同时建构社会主体对共青团的组织认同和价值认同,由此确保共青团工作实效性得到切实提升。

(二)从“内部”环节着眼,确保共青团工作资源系统内各要素的功能得到最大程度发挥

首先,要树立共青团工作资源化和系统化思维,为共青团工作的科学发展提供理念根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共青团工作资源系统能否实现科学建构与整合,作为该系统管理主体的各级共青团必须在治理思维上实现创新。一方面要树立共青团工作实践的“大资源”思维,即必须明确共青团工作的开展不仅需要以制度资源、组织资源和人力资源为保障,同时也需要强化历史资源、理论资源、社会资源、物质资源等的多元投入,只有基于宏观视域才有助于将共青团工作开展的各类因素纳入工作资源体系,才能形成共青团强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要树立共青团工作资源的系统管理思维。帕森斯、阿尔蒙德等对社会政治系统的结构功能分析,表明了系统管理思维在社会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性。将共青团工作中的积极要素资源化,并由此进一步对其进行系统化管理,必将为推进共青团工作绩效的最大化发挥作用,这也是共青团落实中央改革方案精神的应然取向。

其次,推进共青团工作资源各要素的协同发展,为共青团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保障。就当下我国各级共青团的发展实践来看,对共青团工作的理论资源、组织资源、权力资源、历史资源等关注较早;而对制度资源、物质资源的研究利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水平的提升也在走入正轨;相较而言,对共青团工作开展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源的吸纳与利用还较为薄弱,尤其是在市场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极易出现资源流失。与此同时,近些年学界在相关研究上关注较多的也还是集中在组织、制度建构领域,全方位关注和分析的不足是导致相关共青团工作资源积累中出现“马太效应”的重要根源。当下亟须做好共青团工作资源系统的协同发展工作,通过对各类要素资源的存量评估,由此形成共青团工作中有关理论、制度、权力、文化、人才、组织和物质等资源均衡提升的局面,以确保工作资源系统发挥最大能效。

最后,保持共青团工作资源系统的开放性,确保系统同外在环境互动的持续性。系统科学认为,系统本身的稳定源自于系统的开放性,及其同外在环境之间良好关系的建构。对此,耗散结构理论就指出,系统的孤立化是导致系统无序性的重要根源,而通过系统与其外界的相互作用,就能够有效抵消系统内部不断增大的熵值,使系统进入相对有序的状态。系统科学的相关理论表明,要实现共青团工作资源系统的稳定,维持资源系统与外在环境的有效沟通是必要前提。这就要求各级共青团组织在工作实践中既要从外部环境中不断挖掘有关自身发展的理论、制度、权力、物质、人才等相关资源,同时也要着力将各类资源在整合后及时、有序地作用于青年工作实践,由此才能在维持熵值平衡的前提下,推进共青团工作资源系统进入耗散结构的良性状态。

(三)从“出口”环节着眼,强化对共青团工作资源系统输出过程的信息反馈

“帕累托最优”是对社会整体资源的最合理配置,其重要目标就在于最大程度地减少浪费和提升效率。当前,要使共青团工作资源配置达到理想状态,以契合《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对共青团运行机制、机构设置以及干部选拔、使用和管理等方面实现完善化的内在诉求,除了要把握系统的“入口”和“内部”环节外,还需要积极加强对系统“出口”环节的反馈工作。伊斯顿高度重视政治系统的反馈环节,认为其能够产生“新的见解”,并有助于对“政治系统的持续和变化作出新的阐释”^[11]。为此,一要积极疏通社会各界对共青团工作资源系统的信息反馈渠道,推进共青团工作资源系统政策输出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共青团要坚持团务和政务公开的基本原则,将共青团的活动原则、责任主体、经费开支等信息及时进行公开,同时要建立相应的权力清单制度,为避免组织自身的官僚化倾向、拓展社会参与范围提供保障。二要积极建构共青团工作资源系统反馈绩效的科学评估机制,确保反馈信息得到切实回收和再利用。绩效评估作为提高决策效能和规范组织行为的一项重要制度,近年来愈发引起国内管理学界和行政学界的重视。通过对共青团各级组织沟通力、亲和力和回应力等的动态评估,可以为进一步提升共青团的工作绩效提供帮助。当然在具体运作上,不仅要着力建构有关共青团工作资源系统信息反馈的机制,同时还应积极引入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在提升信息反馈绩效的过程中实现共青团工作资源系统的最优配置。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切实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 开创新形势下党的群团工作新局面》,载《光明日报》,2015年7月8日。
- [2][3][4]《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296、297页。
- [5]《共青团中央2014年预算公布》,http://www.ccy1.org.cn/notice/201404/t20140418_688017.htm
- [6]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 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 郑世平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 [7][11]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7、347页。
- [8]刘丙元:《论文化多元化背景下的共青团话语系统建设》,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 [9]胡新颜 郑雪花:《基于“需要-动力”系统的高校共青团组织效能建设研究》,载《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年第31期。
- [10]《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载《中国青年报》,2016年4月25日。

(责任编辑:邢 哲)